

我的父亲

梅兰芳

梅兰芳

续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我的父亲

梅

兰芳

梅绍武 著

续集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父亲梅兰芳：续集 / 梅绍武著. 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5306-3786-X

I. 我... II. 梅... III. 梅兰芳 (1894~1961) - 生平事迹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452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20.00 元



目录

- 001 《梅兰芳和高尔基》补遗
- 005 梅兰芳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 011 沟通文化 促进邦交
——记父亲首次访苏时的题词和通信
- 016 梨园泰斗和百老汇主教
——记父亲和大卫·贝拉斯科的会晤
- 025 梅兰芳·肖恩夫妇·《霸王别姬》
- 037 观梅剧受益甚多的美国单人剧大师露丝·德雷珀
- 042 梅兰芳和波摩那学院
- 048 访美演出盛况拾遗
- 057 访美演出美方赞助人一览
- 068 梅兰芳和日本戏剧之父坪内逍遙

072	“把中国戏曲在世界艺术场中占一个优胜的位置” ——记父亲创办国剧学会
081	勤俭才能兴家园 傲骨从来耐岁寒 ——春节忆父亲二三事
085	读父亲三篇旧文有感 (附)梅兰芳:诚意来应付,虚心来研究 梅兰芳:登台杂感 梅兰芳:我理想中的新中国
095	有乡先生能赏音 折节交到忘年深 ——记父亲和张謇先生的深厚友谊
106	胡适的一篇佚文:《梅兰芳和中国戏剧》
112	梅兰芳与丰子恺 (附)丰子恺:访梅兰芳
121	梅兰芳和黄佐临
125	京昆艺术两大师 ——忆父亲和俞振飞的友谊
135	泰州寻根记
143	和王琴生先生的二次谈话 ——续谈父亲的表演艺术及其他
186	梅兰芳与新加坡一段缘
192	“梅学”在国外
	附录:
200	梅兰芳记事(1955年1—5月) 许姬传记 梅绍武整理
236	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 观比较 黄佐临
250	艺术的强大动力 ——1935年苏联艺术家讨论梅兰芳艺术记录 (瑞典)拉尔斯·克莱贝尔格 整理 李小燕 译
266	梅兰芳 ——西方舞台的诉讼案和理想国

275	(法)乔治·巴纽 著 傅秋敏 王慷 译 梅馨远流樱花国 ——1924年日本《演剧新潮》杂志社邀请著名戏剧家 为梅兰芳举行座谈会(速记稿) 金凤吉 译
293	梅兰芳曾留过胡子 (日)尾崎宏次 著 (日)菅谷音 译
303	后 记





《梅兰芳和高尔基》补遗

去年夏季，在南京召开的一次外国文学会议期间，戈宝权先生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件从苏联收到的礼物。”

交到我手里的是一个挺大的信封。我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梅兰芳五十年前赠给高尔基的一张六英寸照片的复制件。父亲那时正当中年，身穿中式服装，神采奕奕，照片上有他的亲笔题字和印章。我久久握着戈宝权先生的手，对他为我搜集到先父访苏的文献资料再次表示感谢。

为什么说再次感谢呢？这是因为1983年秋我写过一篇题为《梅兰芳和高尔基》的文章登载在《文艺报》1984年第1期上；动笔之前曾多次向戈宝权先生请教，征询了不少问题。他不仅提供给我一本他的叔父戈公振先生的遗著《从东北到庶联》，嘱我参考其中他们叔侄合写的《梅兰芳在苏联》一文，而且还为我查到了196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高尔基生平与创作年谱》第四卷中有两处记载先父同高尔基交往的情况。

1935那年，戈宝权先生是天津《大公报》记者，曾随梅剧团乘苏联特地派往沪滨接我父亲的“北方号”专轮一起前往苏联。这里顺便提一下父亲那次访苏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如今已不大为人所知的、动人的插曲。那就是1934年初，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起邀请我父亲访问演出的计划，并委托戈公振先生协助联系，经过几个

月的接洽，一切商妥。但是梅剧团前去苏联需经东北，而那时正逢伪满洲国成立，父亲是个爱国主义者，坚决拒绝通过那里，当时又无中苏直航飞机可乘，苏联之行看来由于交通问题而难以实现。苏方闻讯后，当即再次洽商，最后决定派“北方号”专轮到上海迎接他直赴苏联，并发出一封正式邀请信。

梅兰芳先生：

阁下优美之艺术，已超越国界，遐迩闻名，而为苏联人士所景仰。兹特敦请阁下莅临莫斯科表演，以求广为介绍于苏联民众之前。所有戈公振先生开示各节，遵当接受，惟盼阁下能于明年3月15日莅临。敝会自当竭诚招待，以谋阁下旅途安适。并深信，阁下此次莅临敝国，将使中苏两国间文化之关系，益臻亲密也。专此，即颂

时绥

苏联对外协会代理会长

库里斯科

于是1935年2月21日，父亲便登轮直赴海参崴，然后再转乘西伯利亚特别快车，于3月12日抵达莫斯科。苏方还为此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委员当中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梅耶荷德、爱森斯坦、泰伊洛夫、特莱杰亚考夫等著名文艺界人士。梅剧团在莫斯科演出期间，莫洛托夫、李维诺夫、伏洛希罗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高尔基和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等文学家，契诃夫夫人和柯兰女士等名演员均前往观剧。父亲在苏联的一切重要活动，戈宝权先生都参加了，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当场拍摄了许多照片，寄回国来登载在当年的《良友画报》上面。其中一张是父亲在列宁格勒艺术家俱乐部为苏联著名剧作家、导演和演员做一次有关中国戏曲的学术报告的场景，担任翻译的是我国翻译界老前辈耿济之先生，我发现在那些聚精会神听讲人当中还有当时流亡在苏联的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



父亲和高尔基相晤后，后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赠送照片，以表敬意和谢意。事隔半个世纪，这张照片现在居然出现在我这晚辈的眼前，怎能不叫我激动呢？至于这个复制件是怎样得到的呢？戈宝权先生在去年9月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

自从你写的《梅兰芳和高尔基》一文发表后，由于你的请求，当即写信到莫斯科去，请在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协助查询：一是高尔基看过梅先生演戏后，有无这方面的评论资料可寻；二是可否从高尔基博物馆索取到梅先生送给高尔基的照片的复制件，因为高尔基博物馆同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在一起，他去查询很方便。

顺便告诉你，我和李福清很熟。他的原名是鲍里斯·里沃维奇·李维清，是苏联现在知名的中年汉学家。1983年他曾来我国访问过，听说今后还要来。

他在1984年9月1日复我的信中说：“给高尔基写信请他表示对梅兰芳的演出的意见，就是胡兰畦（两三年前我已在《文艺报》上看过她的回忆文章）。但因我所资料室负责这材料的人请假，我还未见过信，只看了卡片目录室的卡片。过些时候一定抽空写篇小补遣寄给你。”这里提到的胡兰畦是我国的一位女作家，曾写过《在德国女牢中》一书，参加过1935年苏联举行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我在1935年去苏联时，曾由我的叔父带我去看过她，因此同她相识。

……

去年11月24日，他又来信，其中说：“现托中国画家代表团带给你我所复制的梅兰芳送给高尔基的照片，”这就是我送给你的那张照片。

戈宝权先生在信中还说李福清告诉他，目前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的彼得罗夫教授也想起了梅兰芳在列宁格勒与阿列克赛耶夫以及一些汉学家交谈的往事，也准备写篇小文，因此他会写信给这两位苏联汉学家，请他们把有关文章寄来，以充实一些我的研究。他还嘱我把《我的父亲梅兰芳》一书赠给高尔基博物馆和李福清，我已在去年托戈先生转去，并请他代向李福清教授

致以谢意，殷切盼望早日见到他们对我那篇拙文补遗的精彩文章。

坐落在北京护国寺街的梅兰芳故居博物馆，在党中央和文化部亲切关注下，现已修葺一新，预料不久即可开放。上述那张照片，父亲在解放后再次访苏联时带回来的一尊高尔基铜制浮雕像，以及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当年亲自署名赠予的一本他的美学论著《电影造型的原则》等等文物资料都会陈列出来，我想，它们无疑会象征着中苏两国文艺工作者源远流长的友谊。

今年是高尔基逝世五十周年和先父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谨续写此文，以示缅怀。

1986年1月10日写



梅兰芳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954年国庆五周年的时候，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洛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应邀来我国访问演出。在天桥剧场上演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那天，我父亲看完之后，特地到后台向苏联演员们道谢。

他们笑着问道：“您看到戏里面的四根柱子有何感想？”

他答道：“我懂得，我完全懂得那四根柱子的含意，这是你们为了追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艺术思想上的巨大成就而把它们设计在这出名剧里的。当年老先生把自己住宅里的大客厅改为小型舞台，里面就有这样的四根柱子。”

他们齐声说道：“您说得极了！”

斯氏客厅里的布置我父亲怎么会知道得



这样清楚呢？这就要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结下的一段友谊了。

切磋艺术话甘苦 诚邀观剧共心声

1935年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我父亲前去访问演出时，曾经专门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委员当中为首的一位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当儿，父亲41岁，而斯氏已是70多岁的老人，虽患有心脏病，却仍然出席了欢迎会，并多次到剧场观看京剧。老前辈这番盛意使我父亲深受感动。于是，他便约定一个日期，与张彭春和余上沅两位艺术顾问同去拜访，以表谢意。

他们乘车来到斯氏住宅前方的街口，下车后还需走一段路才到达一座古老宅邸的门前，只见老先生早已在门口守候迎接。见面后，斯氏紧紧握住我父亲的双手足有一分钟之久，脸上流露出神交已久的神情；我父亲也十分激动，一时竟想不出适当的话语来表达感激的心情，两人携手走进一间宽敞的书房。父亲先把自己从北京带去的几个泥塑戏装人形、一套脸谱和一部关于自己的表演艺术论文集赠送给斯氏，老先生非常高兴，鉴赏良久，还询问了那几个戏装泥人所表演的剧情，然后郑重地把它们安放在书架上。

接着，两人便畅谈艺事，交换彼此在艺术上亲身体验到的甘苦得失。父亲详细介绍了中国戏曲的源流和发展情况，斯氏一边听，一边提出许多深感兴趣的问题。50年代初，父亲曾在一篇怀念斯氏的文章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其中写道，“老先生理解深刻的程度使人敬佩的，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民族形式的戏曲表演方式他能够常常有精辟深刻的了解，譬如他着重地指出‘中国剧的表演，是一种有规则的自由动作’，这还是从来没人这样说过。”^①



谈兴正浓时,有人进来请斯氏去审查他执导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两场戏。他便请客人一齐下楼到客厅去看他排戏。那间客厅很大,内有四根柱子,靠墙放着三把高背椅子。据闻当初老先生一搬进苏联政府赠给他的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房子,就说:“这样一间华丽的客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途,”遂把它改成一个小型剧场,演出时,他还亲自拉幕,照料场子。大家坐在舞台前面临时摆好的一排椅子上观赏。斯氏一边聚精会神地看,一边小声把修改意见告诉身旁的秘书记在本子上。戏排完后,天已经快黑了,父亲在告辞前,斯氏坚持请他坐在一把高背椅子上,自己则谦逊地坐在一把靠背稍低的椅子上,合影留念。在那次亲切的会晤中,斯氏对待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他那慈祥而严肃的面容,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无怪乎他脑际中深深记住了客厅里那四根柱子。

旧地重游怀故友 情谊当随世代传

1952年岁末,父亲在参加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路过莫斯科,再次受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热情接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于1938年辞世,父亲怀念旧友,前去参观斯氏故居纪念馆。

他首先给引到老先生那间非常朴素的卧室,斯氏生前的秘书指着靠墙摆着的一张单人木床说:“老先生就是在这张床上去世的。”父亲凝视着那张床,不由得眼眶湿润了。接着又参观各间陈列室,见到斯氏一生扮演的众多角色的剧照、主演莎剧时全身披挂的甲冑以及其他许多珍贵文献,诸如斯氏亲笔删节的契诃夫剧本原稿等等。

随后,秘书引进两位主人,是斯氏的儿子和女儿。他们陪同我父亲走进书房,并从书柜里取出当年他送

的论文集、脸谱和戏装泥人，还从中挑出斯氏生前最喜爱的一个泥人给他看。父亲又赠了一本《舞台生活四十年》，在留言簿上写了几句深切怀念斯氏的话。下楼走进大客厅，我父亲又见到那个小型舞台、那四根柱子和那三把高背椅子，感慨地谈起当年他和老先生一齐观剧和合影的情景，他们当即找出那张照片，只见老先生亲笔在上面记载了日期——1935年3月30日。斯氏子女郑重地将那张照片送给他，还在上面签了字，以作纪念。父亲回国后就把它挂在护国寺街住宅的客厅里。如今国内画刊时常刊载的就是这张珍贵照片。

尤其使我父亲感动的是，他那次到达莫斯科的头一天，著名导演柯米沙日卫斯基告诉他，斯氏在导演最后一出戏的时候，还对演员和学生们经常提起他的名字。父亲在《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53)一文中写道：“我听了这句话，既惭愧，又感到莫大的鼓舞。去年秋间，我曾重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著《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自我修养》，对他的‘体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今后我要更深入地向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学习。”^②后来，他常以斯氏所说的“爱你心目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你”这句名言教导他的学生，同时表示应该“把我们的戏曲遗产，也用科学方法整理出完整的体系，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服务。”^③

艺院重过百感生 斯翁老眼品评精

父亲1961年逝世，田汉老写了25首《梅兰芳纪事诗》，称“这几首拙作就算我献给他墓上的花环吧。”其中第15首是：

艺院重过百感生，
斯翁老眼品评精。
诗情画意输华剧，

莫负东方学派名。

并且加注道,“1957年兰芳同志参加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祝贺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曾同看莫斯科艺术剧院等剧团名剧。一次欢迎席上,大导演某氏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前一月曾推荐大家注意中国戏,说‘中国戏有充满诗意的、样式化了的现实主义’。斯氏所接触的最好的中国戏当然主要是梅兰芳的表演。兰芳同志对完成戏剧的中国学派或东方学派的号召,也抱有雄大的理想,赍志以歿,可惜之至!”^④

1962年,田汉老又写了一篇题为《追忆他,学习他,发扬他!》的文章怀念我的父亲,其中再次提到中国的戏剧学派,“应该承认中国戏剧艺术是早有它自己的学派的,千百年来无数戏剧艺术家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表现自己的生活 and 斗争的独特形式。我们戏剧的民族形式达到了高度发展,不只是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也受到一些外国人民的欢迎和尊敬。兰芳同志三十年代以来几次出国,到日本,到美国,到苏联,替中国民族戏剧扩大了影响,宣扬了戏剧艺术的中国学派,他实际是中国戏剧学派的代表人。有些外国农民晓得的中国人,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梅兰芳。一些外国戏剧家又把梅兰芳当成戏剧界的孔夫子。”^⑤

田汉老接着说我父亲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论述的一系列的创作过程和表演法则,觉得与我国某些优秀演员所谈的心得,和他自己一生体会到的艺术经验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很显然斯氏的体系又不能说明中国戏曲的全部精神,因此他一面说我们要“把他的体系适当地运用到中国戏曲里,使我们的传统表演艺术得到新的营养,”同时,他着重地指出要“把我们的戏曲遗产,也用科学方法,整理出完整的体系,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服务。”田汉老认为“这就是说我们要当仁不让地建立中国自己的戏剧学派。”^⑥

我的父亲



所幸的是，后来我国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在他的两篇卓越论文《漫谈“戏剧观”》(1962)和《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1981)中精辟而全面地论证了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京剧)的八大外在和内在的特征，把它提升到理论高度，指出在运用戏剧手段方面，高超之处绝不逊于任何西方戏剧而自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与此同时，斯氏称赞京剧和我父亲的表演艺术是“有规律的自由动作”和“具有充满诗意的、样式化了的现实主义”那两句名言也经常挂在人们的口头上了。

最近，我从一本俄罗斯著名画家费德尔·拉夫连契耶维奇·希德罗夫(ФЕДОР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Сидоров)的画册中发现了两幅画，一幅描绘的是我父亲当年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促膝交谈的情景，另一幅是我父亲的肖像。这是希德罗夫参加莫斯科州委会文化局和俄罗斯美术家协会1975年举办的画家展览会中的两幅大型油画，都画得十分逼真细致，足见俄罗斯人民并没忘记斯梅两位戏剧大师那段友谊，弥足珍贵。现将这两幅画复印附在本书内，以飨读者。

今年8月7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63周年纪念日，8月8日是先父逝世40周年祭日，谨写此文，以缅怀两位终生为艺术而奋斗不息的长辈。

2001年8月写

①见《回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洛维奇—丹钦科》一文，载《梅兰芳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03页。

②③见《回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洛维奇—丹钦科》一文，载《梅兰芳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00页。

④见田汉：《梅兰芳纪事诗》(二十五首)，载1961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⑤⑥见田汉《追忆他，学习他，发扬他！》，载1962年8月9日《人民日报》。



沟通文化 促进邦交

——记父亲首次访苏时的题词和通信

1935年，先父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访问演出，受到苏联人民热烈的欢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梅耶荷德和爱森斯坦等艺术大师都和他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近六十年过去了，俄罗斯人民并没有忘记他。在纪念先父百岁诞辰之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中心副主任阿·伊帕托娃女士通过俄罗斯驻华使

促进
沟通
文化
邦交

梅
蘭
芳
題



梅兰芳 1935 年访苏联时，赠
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题词

馆参赞、俄中友协副主席嘉丽娜·库利科娃女士，转赠给中国梅兰芳研究会一批有关先父那次苏联之行的文献资料复印件，其中包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当时为欢